

跨領域的中國思想史研究

呂妙芬*

過去中國思想史研究主要關注兩方面：一、著名思想家或重要文本的思想內容；二、以思想觀念的推衍流變來介紹時代思潮變化。我們常見的主題如孔孟思想、老莊思想、墨家思想、法家思想，或是漢代儒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清代經學等，都反映這樣的研究旨趣。一般思想史書籍的內容，也多半集中討論著名個別思想家的思想與時代思潮，例如梁啟超（1873-1929）《清代學術概論》、錢穆（1895-1990）《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勞思光（1927-2012）《中國哲學史》等。¹ 近年來這類的研究論著少很多，主要因為這類的研究成果已經很豐富，很難再突破，或者應該說這類對於思想家和文本的解讀，比較被視為是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必須學習與掌握的基本知識。除非是針對過去很少被留意的人物和文本作出有新意的研究，或是想修正過去的某些解釋，否則在今日講究學術創新的環境下，研究者多半會以更明確的問題意識、更多面向的考慮來利用思想史的基本知識，寫出論題鮮明的作品，這些作品也常具有跨領域的性質。

提到跨領域研究，常讓學者又愛又懼，主要因為每一個專業學術領域都累積了非常豐富的研究成果，跨領域的專業知識並不容易掌握到位，研究的挑戰頗大，且常常吃力不討好。但是我們又深知無論人物或事件都不是單面向的，能夠掌握的面向愈廣、線索愈多、瞭解愈深，我們對於思想與歷史的解讀就會不同。而且當我們意識到現代學科的分際與規範是近現代的產物，就會更加自覺到我們對於歷史的認識不應受限於現代學術分科，而應設法回到歷史的脈絡中去理解。因此可以說，跨領域的研究雖不容易，卻是理所當然的。

舉例而言，研究宋明理學家的思想，除了要知道他們思想的內容、師承與學派外，也應知道他們的生平與所生活的環境。這些理學家出身的家庭如何？生長的地方社會和風俗如何？他們的家族或地方社會是否影響他們的學術養成或政治立場？他們多半是通過科舉考試進入官僚體制的士大夫，科舉的制度如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¹ 梁啟超（1985）。《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錢穆（1966）。《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勞思光（1984-1986）。《新編中國哲學史》，臺北：三民書局。

何？科舉與教育的關係如何？當時政治的氛圍如何？理學家們在政治上的交友與主張如何？他們是否捲入重大的政治紛爭？他們平日如何研習和傳講理學思想？他們利用的資源從何而來？他們與佛教、道教的關係如何？……這一系列看似外緣的問題，其實對於認識理學家的思想是有幫助的。上述這些問題自然會帶領研究者進入跨領域的研究，去學習政治、社會、宗教等相關的知識。2003 年余英時先生出版《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研究》，曾引起很多討論，主要因為過去大家很少如此認真地從政治文化與政治參與的角度來研究理學家，近年這樣的研究取徑已漸受關注。² 宋代理學家確實是參與政治的士大夫，若能結合政治、社會、思想、文學、宗教等面向進行研究，將使我們對於思想人物的理解更全面而豐富，也可能有新的發現。黃進興、朱鴻林等學者研究孔廟崇祀的政治與學術因素，以及其與思潮變化的關係，是結合政治史與思想史的研究的重要課題，也吸引許多後學跟進。³ 另外，嘗試結合地方社會史與理學思想的研究取徑也值得一提，張藝曦《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許齊雄《北轍：薛瑄與河東學派》都是很成功的作品，他們的書讓我們看到理學家生活的宗族與社會，理學思想與社會實踐的關係，以及理學思想被傳揚的管道等，這些面向都超越純粹的義理分析。⁴

就國內史學研究而言，從 1970 年代後期到 1980 年代，是中國思想史研究的高峰期，當時錢穆、徐復觀（1904-1982）、牟宗三（1909-1995）、唐君毅（1909-1978）、余英時（1930-2021）等名家的著作廣泛為學生閱讀研習，很有影響力。除了研究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內涵外，此時期最熱門的議題是探討中國從傳統到現代的變化，中國傳統文化與民主、自由的關係，以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意義等。這些研究與那一代學者的生命經歷密切相關，學者們也常懷抱著文化使命，希望藉著學術研究與講學而重建中國人文精神。

到了 1990 年代，國內史學研究有一波大的變化。文化史、法制史、醫療史等領域引領風潮，議題推陳出新，法制、身體、醫療、藝術、記憶、媒體、日

² 余英時（2003）。《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研究》，臺北：允晨文化實業有限公司；方震華（2017）。〈復仇大義與南宋後期對外政策的轉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8 本 2 分（2017 年 6 月），頁 309-345。

³ 黃進興（1994）。《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臺北：允晨文化實業有限公司；朱鴻林（2005）。〈《王文成公全書》刊行與王陽明從祀爭議的意義〉，《中國近世儒學實質與思辨與習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312-333。

⁴ 張藝曦（2006）。《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許齊雄著、葉詩詩譯（2015）。《北轍：薛瑄與河東學派》，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此書原以英文出版，書名為 *A Northern Alternative: Xue Xuan (1389-1464) and the Hedong School*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1)。

常生活、物質文化等面向的研究交織匯聚，加上學者援引社會學、人類學等理論分析歷史文本，傳統思想史研究的議題與方法，顯得較老套而不受歡迎。此變化趨勢不僅反映在各期刊論文與學術研討會，也鮮明地反映在歷史學博士論文的選題上。1980年代國內培養的歷史博士人數不多，選擇從事中國思想史研究的論文課題多半是研究著名學者的思想，如王安石（1021-1086）、葉適（1150-1223）、阮元（1764-1849）、梁啟超等人的思想。1990年以後畢業的博士論文中，思想史領域的論文數量大幅下滑，也很少再以「某人物思想研究」為題，跨領域的課題明顯增加。除了上述結合政治史、社會史與思想史的研究之外，其他如歷史記憶與書寫、新學科的建置與新知識的傳播、書籍史與閱讀史、概念詞彙史、東亞儒學等，都是比較受歡迎的課題。⁵ 以下簡要說明這些近年較熱門的研究趨勢。

歷史研究主要倚靠對文本的解讀，然而文本是在特定歷史時空下、因應不同需要與意圖被人創造出來的，文本並非透明地反映歷史事實。這種現象只要稍微觀察今天各新聞媒體對於同一事件報導之分歧即可明瞭，歷史文本同樣都是帶著特定立場與文體範式的片面記載，因此研究者有必要更細緻地解讀文本的意涵及其生產的脈絡。舉例而言，研究者從「集體記憶的型塑」與「反思歷史書寫」的角度，檢視我們所閱讀的歷史文本，通常能看到文本深受國家體制、時代思潮影響的痕跡，讓我們對一些耳熟能詳的文字表述有更深的警醒與反思，也更深刻體會到看似清晰的文意其實並不單純。例如，黃帝何時或如何成為中華民族的始祖？沈松橋深入的研究告訴我們是在晚清國族建構的過程中形成的，而且這項關於「黃帝」與「國族」的論述工程，並非某人獨立完成，而是有不同政治理念與勢力的人共同參與的。⁶ 除了研究一個文本或論述被創造的過程外，這些文本與論述日後可能會被遺忘或重新再發現，也可能不斷地被重刊、重述、重新詮釋與運用，這些複雜的過程也是思想史家研究的重點。

新知識的產生與傳播也是學者關心的議題，這樣的研究通常需要同時考慮制度與思想的關係，因此也多半具有跨領域研究的性質。例如，研究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由於西方思想大量而快速地湧入中國，強烈衝擊著傳統的體制與文化，中西與新舊接遇雜糅的過程十分複雜。此時期有許多新知識、新價值逐漸形成，而新知識的形成與傳播除了與時代政治和思潮有關，也必須倚賴新的學

⁵ 詳見呂妙芬（2021）。〈臺灣漢學四十年——裂變與跨界的思想史研究〉，收入耿立群主編，《深耕茁壯——臺灣漢學四十回顧與展望》，臺北：漢學研究中心，頁 335-368。

⁶ 沈松橋（1997）。〈我以我向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28 期，頁 1-77。

術制度、教育體制、傳播媒體等，甚至有一個跨國的全球網絡關係。中國於 1905 年廢除科舉之後，新的教育體制和新學科逐漸形成，今天我們習以為常的學術領域、學習與思考方式、研究與寫作的形式等，都是這段歷史的遺產。研究現代意義下的中國哲學、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等，都不可能不顧及新教育體制與學科的建置，以及過程中借鏡西方與日本的經驗，當然中國傳統文化同樣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此，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研究不僅需兼顧傳統與新學，通常也必須考慮國際情勢、新教育體制、新傳播媒介、跨國傳播等多元面向，以及新知識與觀念傳入後被修改與挪用的情形。⁷ 以西方醫學知識和治療方法進入東方為例，即使西方醫學挾帶著科學的強勢，到了二十世紀，仍無法全面取代東方對於身體的看法與醫療知識。中醫如何在西醫的挑戰下繼續生存？中醫和國家的關係如何？東方醫療傳統與西方醫學接遇的歷史，既是科學、政治與文化交流的議題，同時也是關乎身體、心理、生命、自我、哲學、宗教文化的多元課題。⁸

書籍史與閱讀史的研究將關注的視角從書本的思想內容，轉移到書本的物質形式，以及印製、出版、銷售、流通等面向，也關注書籍被人們以不同方式閱讀或使用的情形，或者人們閱讀的經驗等。這類研究有更強的物質文化史、社會經濟史、日常生活史的面向，也往往能更深刻地說明書籍的影響力、書籍與人的互動過程。⁹ 另有些研究則專注於考察一些重要的關鍵語彙，如科學、自由、民主、權利、革命、文明、個人、國民等，分析這些關鍵語彙如何形成、如何跨國傳播、被接受與挪用的歷史。研究者透過這樣的分析，說明新觀念與新價值逐漸形成的過程，以及它們如何標幟著歷史演變的軌跡。透過考察這些語彙的形成，以及其被接受與論述的樣態，我們通常可以看到傳統文化、世界潮流、國民心態、某些關鍵的人物或書籍、現實政治需要等多重因素之間的交互作用。而且這些語彙不僅是被創造、被賦予意涵的被動存在物而已，它們同時扮演著動員歷史的重要角色。這類詞彙史、概念史的研究近年也頗受關注，

⁷ 劉龍心 (2002)。《學科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臺北：遠流出版社；韓承樺 (2016)。《當「社會」變為一門「知識」：近代中國社會學的形成及發展 (1890-1949)》，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鄭宗義 (2013)。〈中國近現代思想中的「哲學」〉，收入沙培德、張哲嘉編，《近代中國新知識的建議》，臺北：中央研究院，頁 69-110。

⁸ Sean Hsiang-lin Lei. (2016). *Neither Donkey Nor Horse: Medicine in the Struggle over China's Modern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Yu-chuan Wu. (2016). A Disorder of Qi: Breathing Exercise as a Cure for Neurasthenia in Japan, 1900-1945.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 71(3): 322-344.

⁹ 關於明清書籍史，見涂豐恩 (2009)。〈明清書籍史研究回顧〉，《新史學》20 卷 1 期，頁 181-225；關於西方閱讀史研究，見李仁淵 (2019)。〈閱讀史的課題與觀點：實踐、過程、效應〉，收入蔣竹山主編 (2019)，《當代歷史學新趨勢》，臺北：聯經出版公司，頁 71-114。

雖然研究主題是關於某詞彙之形成、翻譯與變化的歷史，但其實觸及了多元的歷史因素與變動，同樣需要跨領域的視野與知識才可能深刻地解讀。¹⁰

另外，近年來全球史研究十分興盛，思想史也搭上這波風潮，許多人都關注思想觀念在全球各地流傳、碰撞的歷史，也有學者稱之為「思想史的國際轉向」。¹¹ 帶著全球史的視野，學者們對於思想變化的觀察，也從某國某地的歷時性變化，轉向同時性的空間變化。這些研究多半會留意思想傳播的過程、傳播的媒介，也會分析外來思想與本土文化接遇後產生的混雜與變異的樣貌，其中本土的政治、社會、文化更是觀察外來思想被接受與挪用的重要面向。雖然全球史廣泛受到學界重視，但實際從事研究並不容易，許多研究仍是鎖定某些國家或區域，觀察思想的接遇與流傳，或者進行思想比較研究。臺灣學界近年來對於東亞的研究十分熱門，其中最突出的應是東亞儒學的研究。由於東亞各國長期有密切的政治、經貿、思想交流，且有漢字、儒教、法令、宗教等相近的歷史文化傳統，無論就思想的傳播或比較而言，都有許多值得研究的課題。許多學者投入研究日本、朝鮮、越南的儒學思想，以及各國與中國、各國彼此間的交流，成果斐然。臺大出版中心出版「東亞文明研究叢書」、「東亞儒學研究叢書」近 200 冊學術著作，可為代表。¹²

以上是近年國內中國思想史研究一些新趨勢的簡介。¹³ 這些新的趨勢除了與學術標準普遍提高、研究者欲開創新穎的研究成果而採取更多元的研究視野有關外，也受惠於近年大量新史料的出土與重刊、資料庫便於檢索，以及研究環境的提升。雖然跨領域的研究打破學術領域的疆界，沖淡思想史義理分析的濃度，實作上也有相當難度，需要仰賴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但是能以多層次、多面向的方式探析歷史，呈現歷史的複雜性，成果引人入勝，則是可喜的現象。

¹⁰ 關於概念史研究，參見陳建守（2013）。〈語言轉向與社會史：科塞電克及其概念史研究〉，《東亞觀念史集刊》第 4 期（2013 年 6 月），頁 171-221。

¹¹ 大衛·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2013）。〈思想史的國際轉向〉，《思想史》第 1 期（2013 年 9 月），頁 213-241。

¹² 關於臺灣近年東亞儒學研究，見張崑將（2019）。〈近二十年來台灣的「東亞儒學」研究取向與發展特色〉，收入北京師範大學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編，《東亞文明的歷史與展望：東亞文明交流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306-332。

¹³ 其他如感覺史、數位人文等也是很受重視的新研究領域，請參閱蔣竹山主編（2019）。《當代歷史學新趨勢》，臺北：聯經出版公司。